

牡丹江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牡丹江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夺取牡丹江市政权和剿匪工作回忆……………李荆璞（1）

刘少奇主席视察东京城林区……………关 魁（24）

解放初期牡丹江市朝鲜民主同盟的活动……………梁在华（27）

抗联的一个联络点……………于福喜口述
于寿山整理（31）

夺取牡丹江市政权和剿匪工作回忆

李荆璞

(一)

牡丹江市在伪满时是东满总省的所在地，管辖间岛省、东安省、三江省和牡丹江省，是个战略要地。当时的日寇反苏战略中心，就设在牡丹江市。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东北局根据干部地方化的方针，分配我回牡丹江开辟工作，任命我为牡丹江省军区司令员，任务是大抓武装建设，组织人民军队，消灭土匪、汉奸，建设革命根据地。东北局还决定谭文邦同志为牡丹江军区副政委，张静之同志为军区政治部主任。我和谭、张两位同志带领三名警卫员从沈阳出发先到长春去找原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同志，请他介绍牡丹江情况。他说牡丹江有原来抗联五军一师的金光侠和陶玉峰同志，他们随苏联红军早到了牡丹江，你们找到他俩就能了解情况啦。

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晨，我们六人到了牡丹江市，下了火车住进合江旅馆。在吃早饭的时候，听到街上叫卖“合江日报”，我们买了一份报纸，摊开一看，吃了一惊，报上公布“牡丹江市政府正式成立，国民党市党部、省党专开始办公”。我想，好快呀，国民党抢在我们前头了。我们必须抓紧工作，饭后他们几人在旅馆休息，我立即到苏联红军司令部去接关系。我来到苏联红军司令部，一位中将（名字不记得了）接待了我，他看完了我的介绍信说：“你是牡丹江省军

区司令员吗？”我说：“是，我党东北局派我来，是创建牡丹江省军区，组建人民军队的”。他说：“你这个军区司令不能在牡丹江市内活动，到乡下去搞军队吧！”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因此，国民党在牡丹江是合法的，你们是不合法的！”我看他把话说得很死，不能再谈了，需要另想对策。

紧接着，我找到金光侠和陶玉峰同志，一见面，金光侠就说：“老师长可把你盼回来了”。陶玉峰问：“你带多少队伍回来的？”我说：“队伍还没来到，只是我们三个干部带了三名警卫员来的。”我接着说：“咱们到合江旅馆找个房间详细谈谈吧！”金光侠说：“那个旅馆可住不得，情况非常复杂。”经过商量决定到满铁医院去，那栋楼房空着。我们到那一看，楼房里空无一人，锅炉暖气全破坏了，屋子很冷，当时我说：“情况不允许我们再去找暖和的房子，咱们就在这冷屋子里先开个会，把情况研究研究，把如何开展工作定下来。”就这样，三个警卫员放哨，我们五个人的会议开始了。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应当想办法，在市内站住脚，如果到郊区去开辟工作，国民党在市内耀武扬威，对我们建立军队是很不利的。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市政府的组成主要是敌伪残余势力，其中有个别的国民党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必须把牡丹江市的政权夺过来。怎样夺呢？看样子就得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去当市长。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因为金光侠和陶玉峰两位同志是随苏联红军早到了牡丹江，所以我和苏联红军打交道是有基础的，于是，我第二次又去苏联红军司令部，还是那位中将和一位少将接待了我。中将问：“你有什么事呀？”我说：

“我要接任牡丹江市长”。经过反复商量，他们俩人同意了，并答应派人送我去上任。我提出：“还需要武装警察维持治安。”中将问：“你要多少武装警察？”我说：“至少一千人。”中将说：“不行，最多不超过三百人。”我想，只要准许我搞武装，数量他就限制不住了。

同志们听说苏联红军司令部同意我接任市长，都很高兴。于是，我们继续开会，听取了金光侠、陶玉峰两位同志对牡丹江市情况的介绍。我们深深感到，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国民党不仅成立了市政府、市党部、省党专，办了合江日报，还建立了二、三百人的武装警察队。在乡下有几支杂牌队伍，都在等待国民党接收大员到来。而我们自己力量不大，但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有一支四十多人的武装警察。虽然我们党还没有公开出面活动，可是民主大同盟已组织起来，有盟员一千多人，大多数是朝鲜族。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开辟工作，鉴于牡丹江是个省，我们五人组成了临时省委。他们一致同意我任书记，金光侠同志为副书记，其他三位同志为委员。会议决定要大刀阔斧地办好三件大事：第一，掌握军权，狠抓武装建设，军区司令部就设在满铁医院大楼，并把国民革命军牡丹江军区司令部的牌子挂出去，把现在四十来人的武装警察，改编为军区警卫连，司令部设上岗哨。金光侠同志去大同盟，动员盟员参军，陶玉峰同志去动员铁路失业工人参军，动员来参军的人员，由谭文邦副政委组织训练，枪支弹药由金光侠和陶玉峰同志负责，和苏联红军司令部联系解决。第二，要开展工作，还得有干部，张静之同志去宁安组建军政干校，招收青年学生，训练三个月分配工作。第三，

我去接任市长，并部署了侦察国民党动态的任务。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当天晚上军区警卫连就扩大到二百多人，又成立一个保卫军区首长的警卫排五十多人，我的警卫员王根很任排长。动员来的新兵绝大多数是大同盟的盟员，少数是年轻的失业工人。陶玉峰同志从苏军缴获日伪军武器的仓库里运来比较新的枪支、弹药武装了军区部队。保卫首长的警卫排三个班，每个班一挺捷克式轻机枪，每人一支匣子枪和一支苏式转盘冲锋枪。为给接任市长做好准备，经过商量，张静之同志连夜给我写了一张委任状。考虑到国民党有武装，在接任市长时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做了周密的部署，安排军区警卫连五十多人做好战斗准备，和我一同前往。

第二天早八点，我穿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带了两支手枪（我两手都会使枪），由苏军司令部一位少校领着到了市政府。一进楼就在楼梯上下口，房门口都站上了我们的警卫员。走进市长办公室，我看见坐着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看见苏军少校领着我进来，就都站了起来，带着吃惊的脸色。苏军少校走到市长办公桌的前边，对原市长说：“这位（指着我）是中央派来的新任市长，谷市长（即谷怀贵）作为第一副市长，其他副市长不变动”，他说完转身就走了。谷怀贵由市长座位上走下来，站在沙发跟前，我上去坐在市长的座位上说：“你们请坐”，我把自己的委任状拿出来往桌上一放，他们都站起来伸长脖子看，我没等他们看清，就收起来了。我说：“你们向本市长汇报一下市政情况”。一位姓刘的副市长说：“昨天来了六个八路军（我们来牡丹江时穿八路军的军装），住在合江旅馆”。我问他：“你说的六个八路军今天上哪去了？”刘说：“去向不明，正在侦

案中”。我意识到他说的六个八路军就是我们。因为时间紧迫，不允许说更多的事情，于是我说：“今天的时间来不及了，改日再谈吧！谷市长你把市政府的全体人员集合到院子里，站成方队，我要训话”。他们把市政府人员集合好了，我走到队前，谷市长做介绍说：“这位是新任市长，我们欢迎新市长讲话。”大家鼓掌之后，我向前走了两步说：“我叫李翔璞，今天能和大家见面，我很高兴！我是国民革命军牡丹江军区司令兼市长，由于军务太忙，每天只能到市政府办公两小时，我不来这里时，由谷副市长代行市长职权，但有重要事情必须请示我。所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照常工作，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不论什么人必须廉洁奉公”。这就是我接任市长时的就职演说。我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中午时间大同盟来汇报，说市党部，省党专，合江日报社的牌子都摘了。下午大同盟又来汇报，说市党部，省党专和报社的主要负责人都不见了，连那个刘副市长也去向不明。我一方面布置继续侦察，另一方面考虑对策。我想不能让他们跑掉，他们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反动派，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晚饭后大同盟汇报，说市党部、省党专和报社都在搬东西。我立即把陶玉峰同志叫来说：“你脱了苏军服装，穿上我军衣裳，带着警卫连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今天半夜包抄国民党市党部、省党专和合江日报社，把他们逮捕起来，不能让他们跑掉。还要特别注意搜查文件。”陶玉峰同志问：“市政府抄不抄？”我笑了笑说：“我已接任了市长，我们怎么能抄市政府啊！”陶说：“那不白白地让他们跑了！”我说：“主要的人物已经跑了，你去准备执行任务吧！”当天夜里搜捕完了之后，陶玉峰同志汇报说：“抓了

三十几个人，重要文件一份也没搜着。”我立即让金、陶两军组织审讯，勤杂人员一律放走。第二天（是我接任市长的第二天），接到苏军司令部一位中将的电话问：“你们昨天晚上抓了多少国民党党员？”我感到麻烦的问题来啦，我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要在电话上谈吧，等一会儿我去苏军司令部面谈。”放下电话之后，我向陶玉峰同志了解了详细情况。陶玉峰同志说：“勤杂人员全放了，还有三十个人，一个真正国民党也没有，是些伪满的汉奸，摇身一变都成国民党啦。”我到苏军司令部后，还是那位中将与一位少将接待了我，我向他们说明，一个国民党也没抓，抓的都是汉奸，他们笑了笑不再问了。

经过短短几天紧张的工作和战斗，我们初步的有了自己的武装，掌握了政权，打击了那些敌伪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尖锐复杂的斗争还在后边。

（二）

为了继续深入地开展对敌斗争，我们认真地总结了工作，进一步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做了敌我力量的对比，确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当时形势复杂，但也有许多有利条件：第一，苏军在处理敌我双方问题的态度上是只要我们不使苏军在履行中苏条约（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定的条约）方面发生困难，他们还是支持和援助我们的。第二，在宁安地区“九一八”前就有共产党的活动，我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十四年中，虽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但潜伏下来的共产党员、抗联战士还在积极工作。日本一投降，牡丹江市和宁安县立即恢复起党的外

国组织民主大同盟，还搞起了少数武装，这对我们开创牡丹江革命根据地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三，抗日联军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抗联五军一师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九·一八”事变后，几个雇农夺了大粮户的武装，搞起了抗日队伍，后来改编为抗联五军一师，它在牡丹江一带战斗多年，打日本还是有点名气的。因此抗联干部回来创建革命根据地，还是有号召力的。第四，金光侠、陶玉峰同志给我们打了前站，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特别是在和苏军联系方面，排除了许多困难，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援助。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就是不利的方面：一是缺少干部，我们五个领导人，连个助手也没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没人去做。军区司令部的牌子挂出去了，其实军区机关是空的，没有一个办事机构，开展工作很困难。二是没有基本部队。三是党的力量很弱，市、县委的机构没建立起来。四是在群众中有正统观念，对我们怀疑观望。五是牡丹江省（包括东安地区）只有牡丹江市和宁安县城在我们手中，其它各县城和广大农村都在国民党（包括敌伪残余）反动势力手中，而国民党又大肆进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欺骗宣传，勾结敌伪残余势力，利用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在政治上、军事上加紧向我们进攻。那些中间武装力量，有的在观望，有的向反动势力靠拢。

根据上述情况，按照东北局大抓武装建设的指示，我们决定实行以组建新兵队伍和改编、改造自发武装相结合的建军方针，组建强有力的国民革命军，保卫和建设牡丹江省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很快就把人民军队组织起来了。

原抗联五军一师活动的游击根据地的群众，在“八·一

五”解放时，夺了日寇、伪军的枪支武装起来八百多人的队伍，收编他们为军区警卫营，只派去一名教导员。经过斗争的考验，他们始终是可靠的，后来成为镇压国民党勾结土匪进行“五·一五”反革命暴乱的主力军。

我们通过金光侠同志第二次动员民主大同盟盟员参军，再由陶玉峰同志动员铁路和伐木的失业工人，以及他们周围知根知底的青年参军，组成骨干兵团。仅三天时间，就有一千多青年报名。加强训练，装备优良武器，形成牡丹江省军区一支强有力的拳头，番号定为，牡丹江省军区直属第十四团。这个团后扩充近三千人，编四个营。不久党中央派来一批军队干部，我先给十四团配备。十四团的团长是董振东同志，政委是胡子美同志。这个团是牡丹江省军区战斗力最强的兵团。

同时，我们还由一部分收编人员和新参军的青年共同组建了牡丹江省军区直属保安团，任命军区保安处处长陈文治同志兼任保安团团长。

有一支中间性质的武装，他的头头是开明人士，我们对这支队伍的政策是，主动联合，大力争取。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正式收编，逐步帮助他们提高觉悟，稳定其革命性，补充新生力量，清洗坏分子，纯洁内部。这支队伍编为军区直属第十五团，后来编入第一支队，由肖荣华同志任一支队司令员，谭文帮同志（军区副政委）兼一支队政委。

还有几支队伍的头头是反动的，他们是投靠国民党的。可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组织被摧毁，汉奸、走狗被镇压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向我们靠拢。我们知道他们不可靠，可是当时，我们没有力量消灭他们，所以我们的对策是，争取

他们做暂时的同盟军，那怕是暂时中立，不公开反对我们也好，待我们力量强大了，他们若是再反动，就消灭它。早跟陶玉峰同志拉上关系的崔团驻在桦林，我们收编为十二团，驻在铁岭河的周团来投我们，收编为十七团，张德振、李开江来投我们，编为十九团。还有一支部队驻在海林，来投我们，编为二十六团。我们时刻警惕这四支暂时的同盟军的动向。当国民党中央军进驻长春时，发现他们要叛变，我们决定收拾他们，不能让它白白地跑掉，即使不能全部消灭，也使它少跑一些。十二团的崔团长要拉军队去投谢文东，我就派陶玉峰同志利用以前的关系，去缴十二团的械，结果大部分缴了，少部分跑了。我们把十七团调到军区司令部来开会，狡猾的周团长只带一部分队伍来的，没容他们展开战斗，就被我们缴械了，没来的那部分跑掉了。十九团、二十六团是两个人数多的团，没来得及收拾他们都跑了。叛变跑掉的总共不到三千人。

经过扩军和收编，我军的实力不断壮大，到一九四五年底，我们组建起军区直属警卫部队一千多人，十四团近三千多人，十五团一千五百多人，保安团两千多人，第一支队两个团近四千多人。张静之同志在宁安县办的军政干校收获也很大，为部队培训了不少干部。

这时，党中央派李大章同志来牡丹江任省委书记，并正式建立了牡丹江省军区党委会，由李大章同志兼任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我为副书记。之后，中央又派刘贤权同志来牡丹江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我们有了武装部队，又加强了领导力量，这是开创牡丹江革命根据地的有力保证。

为了巩固牡丹江市这个战略中心，在省委的领导下，

工、农、商各业逐步地得到了恢复，工厂陆续开了工，商店开了门，集市贸易也日渐兴旺起来。

由于日伪统治多年，当时的经济状况很不好。我们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开展反霸斗争，清算敌伪财产，开办了以镜泊湖发电站为主的实业银行。于法真同志任行长。进一步解决了经济建设和军队的经费问题。

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牡丹江市和整个吉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三)

我们掌握了军权，又夺得了牡市政权，敌人是不甘心的，他们采取了更阴险毒辣的手段向我们进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军区司令部。国民党市党部宣传科长张福山，训练科长姜学瑭，三青团员宋××（女）等人秘密组织了“五四青年刷社”，以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公开演出，吸引、诱骗一些青年，暗中搞反革命宣传。他们还以姜学瑭、李宝林（国民党省党部干事）为主笔编印了反动报刊——“北斗日报”，为国民党接收东北制造舆论。与此同时，敌人的暗杀活动逐步升级，在市内秘密的组织了“铁血暗杀团”，团长姜学瑭。暗杀的主要对象是李大章和我等党政军的领导人，妄图夺取军权。张福山、姜学瑭还以国民党特派员、联络员的身份招降纳叛，网罗党羽，收拢一批伪军、警、特，地痞流氓和土匪，大搞建军活动。他们组建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办事处第八支队，王超任少将司令，姜学瑭任上校副司令，马喜山任暂编第一旅旅长，付邦俊任二十五团团长。张德振、高永安、李开江分别任一、二、三团团长，王小丁任二十五团一营营长。匪徒们投靠谢文东、李华

党等土匪，对牡丹江市进行包围骚扰。

盘踞在牡丹江北部高、张、李匪团几次侵入我桦林、柴河等地，烧、杀、抢、掠、洗劫我车马行人，阻止粮食进入市内，制造饥荒，围困我们。在佛塔密抢劫了牡丹江的粮商，在邻县通往牡市的公路上，打死了我运粮的车老板。这时，牡丹江的社会治安也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一连许多个夜晚枪声不断。许多敌人的小报对我进行诬蔑、诽谤，说我是“大土匪头子，发了大财，有好几座楼房、几十垧土地，还有钱庄、银行……”。我去市政府上班，走在街上，几次遭到黑枪射击，有一次把我衣袖穿了个洞。还有一次警卫员在街两旁搜索，被黑枪打死一人。

为了巩固牡丹江市，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查封了“五四青年报社”，查封了“北斗日报”，成立了牡丹江日报社，进行革命的宣传。把从关内陆续来到的老干部，派到骨干团队里去任连、营、团的领导职务，并进行审查、清洗复杂分子的工作，以纯洁队伍，巩固内部。派倪景阳去市公安局任局长（此人是我在延安认识的，他回东北后被捕叛变的事我不知道，后来被我们处决了），整顿警察队伍。原来旧的军警稽查处，经常敲诈勒索老百姓，所以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让他们另谋职业，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保护工厂。同时，加强了市面上的侦察工作，这项工作主要依靠民主同盟。

因为公安局没有改造好，不敢让他们暗中侦察，只能配合我保安部队维持市面治安。由陶玉峰同志和保安处长、保卫科长负责抓社会治安，搜查暗杀分子。这样搞了几天，街上就平静了，夜间的枪声听不见了，所谓的铁血暗杀团也不那么猖狂了。

(四)

党中央非常关怀我们的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张闻天同志来牡丹江，听取了我们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很满意，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并指示我们，一定要把部队工作搞好，为开展剿匪工作做好准备。

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在李大章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军区党委会，讨论研究了剿匪工作的战略方针和战斗方案。在会上我首先发言，主要内容是：国民党的土匪部队，在叛徒、汉奸谢文东的指挥下，向牡丹江市逼近，包围圈逐步缩小，只剩下牡丹江市和宁安县城。我们的部队审查、训练、整编已经告一段落。为了锻炼部队，消灭土匪，现在应当转为战略反击，反击的方针是先南后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具体的作战方案是：分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南攻北守，把南面敌人消灭，要稳扎稳打，奔袭包围，力求全歼，然后再挥师北上。第二个战役，南防北剿。第三个战役，大军东进，解放牡丹江全省（东安地区在内）。会上通过了我的意见。决定军区副政委谭文邦，一支队司令员肖荣华为前线指挥。

第一个战役兵力部署，南进部队五千人左右；保卫牡丹江兵力四千人左右；为防止王超第八支队进犯，西部牵制敌人的兵力一千五、六百人。

伪保安司令郑云峰，旅长马喜山带了五千多人，盘踞在宁安的东京城，南进战役开始，先打东京城。我军刚到东京城附近，就被马匪发现了，奔袭包围就变成了强攻，马匪边打边退。我军攻进东京城后，只消灭马匪几十人，匪主力全跑了。我军牺牲了团政委邹世环同志（为了纪念他，曾一度

把东京城改名为世环镇）。

我军南进解放了东京城，而郑云峰、马喜山匪军却南逃了。我军立即向逃窜方向追击，我下令停止追击，因为当时追击只能把土匪赶跑，消灭不了有生力量。我军在东京城休整待命，做群众工作，同时，加强侦察，摸准匪窝，突然奔袭包围歼灭。

这时，国民党匪军在北面和市内积极配合，牵制我军南进。北面匪军攻占桦林，步步逼近，有进攻牡市之势。市内发生了土匪抢劫事件。国民党有人冒充工商界代表向市政府和军区要求保护他们生命财产。市政府内部也有人提出把南进部队撤回，保卫牡丹江市。我看这是个阴谋，便坚定的说：“南进部队不能往回撤，我们有力量保卫牡丹江安全”。

我考虑在南攻北守的阶段，对北面也不能消极防御，必须争取主动。于是，我带了两个连，夜袭桦林。我们到了桦林，战斗一打响，匪军就撤走了。我分析，匪军不是真败走，好象要诱我追击，而我既不追击，也不占领桦林。我带领部队上了匪军对面的山上，我们和匪军各占一条山岗，互相观察，形成对峙。敌人兵力超过我们若干倍，我们是无力攻击它的，更没有可能攻破他们的阵地。但我又不能撤兵回市内，如果我们一撤退，敌人一定会尾随上来，扰乱牡市。我正站在山头上观察，发现由牡市通往柴河的公路上，开来八、九辆苏军的坦克和汽车。我想敌人弄不清这汽车是苏军的，还是我军的，很可能认为是调来的援兵。这时，我立即下达攻击、冲锋的命令，我军摆开阵容向匪军冲击，匪军不打自溃，连重武器也来不及撤走就跑啦。我们在阵地上缴获了各种炮十九门，给北面匪军一个沉重打击，使我军争取了主动权。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前后，田松支队来到牡丹江市郊，我把他们安排在海林镇，归牡丹江军区领导，大概有七八百人，两个小团。军区党委决定编为军区第二支队，原来的领导干部不动。组成军区政治部，牡丹江报社大力宣传“八路军”开进牡丹江，扩大老八路的影响。

我向二支队全体人员介绍了牡丹江省敌我斗争的形势，说明南进战役已经开始，同志们要马上参加战斗。借着老八路的东风，向匪贼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二月十五日晚，我军冒着严寒分路向盘踞在鹿道、春阳、镜泊湖、天桥岭一带之郑云峰、马喜山匪部四千余人（内有天桥岭李茂庆部五百余人，南湖头王清部五百余人）展开全面进攻，历时十七天，大小十一战。除马喜山带残匪数十人窜逃外，余匪全部被歼，俘匪首滨绥图佳少将保安司令郑云峰以下两千余人，计毙伤匪一团长李金喜，守卫团长李万春以下一千余名，我缴获平射炮两门，迫击炮七门，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二十六挺，掷弹筒二十八个，长短枪两千余支。

我们继续南进解放了附近一些村镇与汪清我军会师，打通了图佳线交通，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同时，为解放全吉东地区奠定了基础。在歼灭郑、马匪帮的南进战役胜利结束后，战役方针转为南防北剿。我军不顾疲劳，立即挥师北上，进行第二个战役——北剿战役。兵力布置，南面在东京城、马莲河、南湖头等地，摆了近一千五百人；西面仍摆了一千人左右；牡丹江市内留下机动兵力三千人以上，北剿的总兵力八千人以上。

三月十五日，我军分路向盘踞于北甸子、桦林、柴河

镇、仙洞、马桥河、杏树底、柞木台子等地的高永安、付邦俊、李开江、张德振等匪部四千多人进行了围剿，战线绵亘数十里。

同日夜晚，我军一路攻打北甸子，没拿下来。我想，北甸战役，首战失利，对整个战役有很大的影响，便亲自去北甸子前线。一看北甸子屯是伪满时人圈（大屯），有坚固的围墙，高大的炮楼，易守难攻。我想硬攻，要花很大代价，也不一定拿下来，只有诱龟出壳歼灭之。我把主力隐藏在东山梁后面，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拂晓前摆开强攻的阵势（实际是佯攻），天快亮时用炮火猛轰后，步兵亮出攻击的动作，待敌人展开火力，我军装着慌忙撤退……敌人大队果然追出“乌龟壳”。我们把敌人诱到南山梁底下，我军占领山梁，回头猛击，东山梁的我军抄到敌后，前后夹击歼敌七百多人，我们来不及打扫战场，快速向北甸子前进，匪首张德振带领残敌逃窜，扔下重武器和很多物资都被我们缴获。

三月十七日午夜，我军主力突然分四路猛扑匪据点，接连攻克板院、四道岗、马桥河、桦林、柴河、仙洞等一镇四村屯，乘胜直追，继续攻克重要匪巢五河林。残匪集结杏树底、柞木台子一带，企图顽抗。派出小股匪徒在五河林、仙洞以东，以南各屯流窜，强迫老百姓准备“万人大军”吃三天的给养，并散布“中央军”二十五日到牡丹江市，由哈尔滨派来三百特工队等谣言。

我军在五河林、仙洞屯休整，派出侦察员了解到匪帮企图逃往密山，先派匪徒和谢文东联系，请他派兵来增援，挽回败局。并在柞木台子、杏树底修筑防御工事。我们决定不给匪徒喘息之机，我军三月二十三日向杏树底前进，先头部